

後現代主義的困境

——「蘇卡爾事件」的思考

• 劉 擎

後現代思潮在中國的「本土化」傾向，帶來了不少爭議。鼓動者正致力於用後現代語詞全面清算中國80年代中以「科學、理性和真理」為主導的「新啟蒙話語」。批駁者憂慮於這一思潮的「非理性、反智主義」的傾向有可能使我們誤入遍布「解構碎片」的思想廢墟。

對於9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post-modernism”早已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至少在十年以前，由唐小兵翻譯整理的傑姆遜(Fredric Jameson)教授在北京大學的演講錄出版後，被統稱為「後現代主義」的這一龐雜的西方人文哲學思潮就開始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在被大量翻譯引介的同時，「後現代主義」逐漸生成為一支新的批判言路，開始活躍在今天人文研究、社會科學和文化批評等領域。

後現代思潮在中國的「本土化」傾向引起了某種興奮，也帶來了不少爭議。鼓動者確信其批判功能在中國語境中的有效性，正致力於用後現代語詞全面審度和清算中國80年代中以「科學、理性和真理」為主導的「新啟蒙話語」。批駁者憂慮於這一思潮的「非理性、反智主義」的傾向，認為這是一條危險的歧途，有可能使我們誤入遍布「解構碎片」的思想廢墟，在價值虛無主義日漸流行的今天特別值得我們警覺。譏諷者則否認後現代言路與中國現狀有任何真實的相關性，嘲笑當

下的「後現代熱」是某些知識份子對西方時髦習慣性追逐的延續，是盲目而膚淺的「拿來主義熱病」的新近症候。而相當一部分學者則在這股「熱潮」中保持冷靜而謹慎的沉默。

實際上，對後現代思潮的這種複雜反應並非中國知識界獨有。至少在美國，後現代話語在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運動中所產生的分歧、緊張和困擾也相當顯著。不久前，由「蘇卡爾事件」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本文將對這場爭論的背景及要點進行引介和評論，並由此闡發筆者對後現代問題的一些初步思考。

一 「蘇卡爾事件」的背景

1996年春季，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著名的「文化與政治分析」學術季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推出一期題為「科學戰爭」的專號，其中發表了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蘇卡爾(Alan Sokal)的一篇論文，題為〈逾越邊界：關於量子

重力學的轉化性闡釋》^①。文章的開篇以挑戰的筆調寫道：

很多自然科學家，特別是物理學家，一貫否認社會與文化批判的學科能夠對他們的研究起任何作用。沒有多少人承認他們世界觀的根基必需依照這種批判來重建。他們寧願固守一種信條，一種由長期的啟蒙主義霸權在西方知識格局中所形成的信條，可以將之概括如下：存在一個外在的世界，其性質獨立於任何個人或人類整體，而隱含於一些「外在的」物理規律之中；通過由（所謂的）「科學方法」配置的「客觀」程序及嚴格的認識論檢測，人們可以獲得可靠的（雖是不完備和暫時的）關於這些規律的知識。

蘇卡爾繼而聲稱，二十世紀科學所經歷的深刻觀念轉移，有力地挑戰了這套笛卡兒—牛頓式的形而上學；科學哲學與歷史的新近研究進一步質疑其可信性；而最近女性主義及後結構主義的批判已經揭開了西方主流科學實踐的神秘外衣，暴露了其隱藏在「客觀性」表象之下的意識形態控制。他自己的論文試圖在這條路徑中邁出新的一步：通過討論量子重力學（一門據稱是綜合了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的物理學新分支）的最新發展表明，科學所依賴的時空、幾何等根本性的概念框架已成為相對的、可疑的。這一觀念革命對未來「後現代的、解放的科學」和社會政治運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這篇論文引用了從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波爾 (Niels H. D. Bohr)、海森伯格 (Werner Heisenberg) 到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拉康 (Jacques Lacan)、德勒茲 (Gilles Deleuze)、李歐塔 (Jean J. Lyotard) 等

的219篇文獻，有109個註釋，以雄辯的文風「論證」：量子重力學擺脫了「絕對真理」與「客觀現實」之類的傳統觀念束縛，是一門「後現代科學」。它應和了後現代文化理論的重要主張：獨立於文化之外的所謂「客觀世界」並不存在，「物理現實」正像社會現實一樣，本質上也是一種「社會和語言的建構」，所謂「科學知識」絕無它所自稱的「客觀品格」，而是產生這種知識的文化中權力關係的產物。後現代科學的崛起有力地否定了傳統科學中的權威主義和精英主義，為進步的政治事業提供了強健的理論依據，「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它將逾越邊界、打破壁壘，有力地支持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激進民主化進程」^②。

令人驚訝的是，蘇卡爾的這篇檄文發表後不到三個星期，一家專事學術界趣聞軼事的雜誌 *Lingua Franca* 登出了蘇卡爾自己的一篇「坦白書」，聲明那篇論文完全是他蓄意編造的荒謬之作，投寄給《社會文本》是想以惡作劇的方式進行一次「物理學家對於文化研究的實驗」(Cultural Studies)：測試一份在北美具有權威地位的、由著名學者傑姆遜和洛斯 (Andrew Ross) 等參加編輯的文化研究刊物究竟有怎樣的學術標準，看看它是否會採納一篇漏洞百出、荒誕之極但編造得貌似有理且投編輯所好的文章。不幸的是，事實證明了他的猜測——「在人文研究的某些領域，嚴格的學術標準正在下跌」^③。

蘇卡爾的聲明刊出後引起一片譁然，立即激起熱烈的反響和爭論，形成了所謂「蘇卡爾事件」。《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新聞周刊》(*Newsweek*)、《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和英國《泰晤士報》

1996年春季，《社會文本》發表了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蘇卡爾的一篇論文。蘇卡爾在不到三個星期後，卻聲稱那篇論文完全是他蓄意編造的荒謬之作，目的是測試一份在北美具有權威地位的、由著名學者參加編輯的文化研究刊物究竟有怎樣的學術標準。不幸的是，事實證明了他的猜測——「在人文研究的某些領域，嚴格的學術標準正在下跌」。

有人指責蘇卡爾這種「惡意的玩笑」本身已經違背了最基本的學術道德；有人激賞「蘇卡爾事件」是一次「絕妙的實驗」，認為當一知半解卻以把玩晦澀的名詞術語來假冒深奧成為時尚，惡作劇式的嘲弄也許是唯一有效的批評策略。但我們首先要追問的是：這個「實驗」到底想證明甚麼？它結果又證明了甚麼？

(*Thames*) 等主要媒體對此競相報導；《異議》(*Dissent*)、《新政治》(*New Politics*) 及《梯坤》(*Tikkun*) 等文化政治評論刊物也紛紛捲入討論^④。而互聯網上更是「群情沸騰」，各種交流小組發出上百篇各抒己見的電子通訊。蘇卡爾任職的紐約大學又組織了一場公開辯論，讓蘇卡爾與洛斯當面交鋒，將此事件推向戲劇性的高潮。「蘇卡爾事件」很快波及法國。正當辯論方興未艾之際，蘇卡爾又在1997年10月推出了一本與比利時魯汶大學的理論物理教授布里克蒙 (Jean Bricmont) 合作的法文版新書《知識份子的欺詐》(*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⑤，出版後立即登上了非小說類的暢銷書排行榜，在法國知識界掀起軒然大波。《解放報》(*Libération*)、《世界》(*Le Monde*) 周刊及《研究》(*La Recherche*) 雜誌組織了專題報導，包括德里達在內的一些著名學者紛紛發表觀感，使「蘇卡爾事件」成為歐美知識界近兩年來最為令人注目的熱門話題^⑥。

在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尖銳的對立。有人指責蘇卡爾以欺騙的手段愚弄編輯和讀者，這種「惡意的玩笑」本身已經違背了最基本的學術道德，是譁眾取寵、博得虛名的負面典型，對科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對話毫無建設性的意義。也有人激賞這是一次「絕妙的實驗」，認為當一知半解卻以把玩晦澀的名詞術語來假冒深奧成為時尚，當所有「外來的」批評質疑都被拒斥為「觀念陳舊」或「政治保守」的傲慢氣息日益膨脹，惡作劇式的嘲弄是有效的、也許是唯一有效的批評策略，將某些「後現代理論家」披着「皇帝新裝」的真相大白於天下。而更多的評論者力圖與情緒性和戲劇化的紛爭保持距離，希望通過冷

靜的討論澄清迷惑和誤解，在不同學科、不同學派之間建立有效的對話。

二 一個物理學家對於文化研究的實驗

毫無疑問，蘇卡爾的惡作劇是有趣的、精彩的，也的確觸及到一些重要的問題。但其意義究竟何在卻有待進一步清理。如果像蘇卡爾自稱的那樣，這是「一個物理學家對於文化研究的實驗」，我們首先要追問的是：這個「實驗」到底想證明甚麼？它結果又證明了甚麼？

蘇卡爾在他的聲明與應答中多次引用了勞丹 (Larry Laudan) 寫在《科學與相對主義》(*Science and Relativism*) 序言中的一段話：「從相信事實與證據的至關重要，到認定一切都可歸結於主觀的利益與看法，這樣一個觀念轉換是我們時代反智主義最為突出和有害的表現。」蘇卡爾感到，美國人文學界的某些領域正是在這種時髦的「觀念轉換」中失去了應有的嚴格學術標準，特別是一些人文學者在他們的「科學」研究論著中，對自然科學新成果的誤解和濫用達到了令他吃驚的地步，多年以來他一直為此而困擾。但作為一個物理學家，他無法確定他對某些人文研究的迷惑不解是由於自己身處外行的理解局限，還是因為那些「文本」自身的混亂離奇。

於是，他決定做一個實驗，蓄意編造一篇荒謬的「論文」，沒有確鑿的證據、沒有明晰的邏輯論證，而只是將一些被任意歪曲了的科學發現成果與某些後現代大師的陳述用含糊不清的語言相互圓說，進而武斷地否認外在世界的存在，否認以科學方法獲取

客觀知識的可能，並推論這樣一種「後現代式的否定性批判」將對進步的左翼政治產生積極的影響，以此迎合編輯的知識取向和意識形態偏好。

那麼，《社會文本》對這篇奇文的採納究竟證明了甚麼？它不過證明了一次編輯失誤。這是《社會文本》的編輯對此事件的解釋，或者說是他們希望公眾能夠接受的解釋。失誤的原因是由於他們對物理學知識的局限造成了「暫時的盲目」，使他們在處理一篇出自物理學家之手卻挑戰傳統科學觀的論文時失去了準確的判斷，他們對其探索性和獨特性的欣賞淡化了他們作為編輯應有的審慎⑦。

這個解釋在最表層的意義上可以成立。從「實驗」設計的邏輯上看，它的結果所能直接證明的只是一個特定的刊物在處理一篇特定的來稿時發生了編輯失誤。然而，任何事件的理解都不應離開它的「語境」作孤立的闡釋。考慮到《社會文本》在文化研究方面的權威地位，考慮到蘇卡爾所仿效的後現代觀點和文風在近幾年的文化研究領域中有相當的代表性，我們有理由進一步探討這一「失誤」背後更深刻的知識學和社會學原因。

作為人文研究的教授，《社會文本》的編輯對物理學的淺陋學識並無可非議。但他們不經任何物理學家的審閱諮詢就發表這樣一篇充斥了專業術語的論文，就可能不是一個簡單的疏忽。在蘇卡爾看來，這是後現代理論在知識問題上的傲慢走向了它的邏輯極致的例證。這種傲慢是盲目的，它並沒有堅實的知識論根基，而是由被他稱為「草率思想」(sloppy thinking)的荒謬性所致。蘇卡爾將其要害診斷如下：否定客觀現實的存在，或者，承認其存在但否定其在知識實踐中的相

關性，一切都只是社會、語言和意識形態的建構，事實和證據並不能用來鑒別知識的可靠性，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都不存在客觀真理，任何陳述的有效性都是相對的(相對於陳述者個人、或其所屬的族群和文化)。這是後現代主義、社會建構主義和認知相對主義所依賴的「草率思想」。

蘇卡爾進一步推論，以這種荒謬的草率思想作為知識論前提的文化研究，當然不可能確立嚴格的學術評判標準⑧：

如果一切都是話語和文本，那麼對於真實世界的知識就是多餘的，物理學也只是文化研究的另一個分支；如果一切言辭都是語言遊戲，那麼內在的邏輯自洽也就無關緊要。於是，不可理解成為美德，引述、隱喻和雙關語代替了證據和邏輯。

蘇卡爾認為，在這種日漸流行的後現代文風中，他所編造的論文還只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例子」。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依照蘇卡爾的闡釋，這個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後現代文化研究在荒謬的知識論引導下，嚴格學術標準必然喪失的例證。然而，這個闡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立仍然需要更為細緻的討論。

首先，具有「哲學敏感性」的學者對於蘇卡爾的「診斷書」立即會提出一系列質疑。例如，本體論上的實在論問題、認識論上的可知論和客觀論問題及語言學中的話語建構問題，彼此雖然存在某種關聯，但不具有直接的邏輯一致關係。一個反實在論者可以同時是一個可知論甚至是認識客觀論者；一個實在論者也可以同時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但是無論在本體論和認

蘇卡爾感到，美國人文學者在他們的「科學學」研究論著中，對自然科學新成果的誤解和濫用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於是，他蓄意編造一篇荒謬的「論文」，用含糊不清的語言武斷地否認以科學方法獲取客觀知識的可能，並推論這樣一種「後現代式的否定性批判」，將對進步的左翼政治產生積極的影響。

蘇卡爾與《社會文本》的分歧在於，前者堅持認為適當的科學方法可以在發現事實的過程中「過濾」社會和文化的影響；而後者則認為任何方法都是在文化和語言中建構的，其中隱含了深刻的權力關係，無法保證其可靠的客觀性。在相當大程度上，這場爭論演變為科學認識論對知識社會學的一場「混戰」。

識論上持哪一種立場，都並不必然導致嚴謹學術性的喪失。從笛卡兒後的「認識論轉向」到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後的「語言學轉向」，這些問題在哲學史上有過許多細緻而重要的工作，達成了一些結論，也存在一些分歧，但不能說都是沒有事實和證據的荒謬奇談。令人驚訝的是，在「蘇卡爾事件」的整個討論中，幾乎沒有人對此進行充分的「哲學清理」。也許是問題過於複雜，無法在三言兩語的辯論中澄清。結果是蘇卡爾以簡潔而幽默的方式宣告了科學實在論的不戰而勝^⑥。

其次，蘇卡爾的「診斷書」具有過於簡單化和概括化的傾向。例如，他沒有區分在龐雜的後現代言說中，到底是誰明確宣稱了「客觀世界並不存在」，誰只是暗含了這個設定，誰僅僅是「懸置」或迴避了這一問題，而誰又是接受了客觀世界的存在而仍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有論者指出，蘇卡爾有效地攻擊了後現代理論中最為極端、也最為荒謬的版本，但他進而用以偏蓋全的方式否定整個具有後現代傾向的文化研究是有失公允的^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申辯中，《社會文本》編輯洛斯和羅賓絲 (Bruce Robbins) 以及該刊的創始人之一阿若諾威茲 (Stanley Aronowitz) 都一再重申，他們不是激進的「解構主義者」，也沒有人會荒謬到拒絕承認客觀世界的存在 (既然如此，又如何解釋他們接受了一篇「荒謬」地否定客觀世界存在的論文？他們對此避而不談)。他們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現實是否存在，而在於我們有關現實的知識是否「明晰」(transparent)？理性、邏輯和真理的含義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是否確切無疑^⑧？

在此，我們可以確認論辯雙方的一致和分歧所在。《社會文本》一方承認客觀現實的存在；蘇卡爾也同意事實本身不是「自明」的，必須服從於「闡釋」。分歧在於，蘇卡爾及其支持者堅持認為適當的科學方法可以在發現事實的過程中「過濾」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但對於《社會文本》一方來說，這種觀念幾乎是「宗教式的信條」，因為任何方法都是在文化和語言中建構的，其中隱含了深刻的權力關係，無法保證其可靠的客觀性。

正是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雙方的爭論陷入了「焦點錯位」狀態：蘇卡爾的證據主要限於論證自然科學內部的知識成長機制的有效性；而另一方則重於強調科學研究的外部環境問題 (誰花錢支持甚麼樣的研究項目等等) 以及科學成果在社會應用中的政治文化控制因素。在相當大程度上，爭論演變為科學認識論對知識社會學的一場「混戰」，從中很難確切推斷蘇卡爾的「實驗」結果究竟證明了甚麼。

三 對「越界」的回應： 檢討後現代主義視野中的科學圖景

然而，筆者認為這場混戰仍然具有豐富的意義，也並非不可解讀。對論辯的細緻考察會使我們發現，「焦點錯位」的主要原因不在於學科之間理解與表達的障礙 (所謂「兩種文化」的交流困難)，而是雙方論點所針對的「問題域」不同所致。蘇卡爾一方集中攻擊的對象是激進的理論——那種將後現代言路延伸到自然科學領域中的「越界批判」，以及對各種知識的有效性不加區

分、全面否定的「總體批判」；而另一方所能辯護的（或者說最後「退守」的），是溫和的後現代言路——那種對知識生產環境及應用效應的社會文化批判。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對比雙方「批評策略的有效領域」來解讀這場混戰的意義，從中得出一些重要的啟示。

首先，後現代理論對自然科學內部知識有效性的否定是一個嚴重的「越界」失誤。

長期以來，某些人文學者為自然科學共同體虛構了一幅漫畫式的荒誕圖景。在他們眼裏，科學家們是一群哲學上的低能兒，在認識論問題上僅僅停留在「機械反映論」的水平，對事實觀察和理論建構中的人性和社會因素毫無反思意識；或者，將科學家們形容為一群幼稚而狂妄的「絕對真理病」患者，對科學知識的真理性陷於盲目的信賴。於是，「後牛頓物理學」所引發的一系列當代科學的新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方法論轉換，被某些論者臆想為「導致了科學認識論的危機」，甚至科學本身的危機，以致得出「可靠的知識在自然科學中也不再可能」的結論。而這一切，完全是某些後現代主義者一廂情願的幻覺。

在這場爭論中，沒有人再繼續堅持這種對科學的天方夜談式的批判。當蘇卡爾在其「偽作」中所仿效的這一言路已成為笑柄，後現代主義者似乎也只有從激進的越界位置上後撤，由對科學內部知識有效性的否定轉向對其外部功能的檢討。雖然阿若諾威茲還提到了科學研究中「觀察的理論依賴」及「研究範式的變革」等問題，但這對於蘇卡爾及其支持者並不具有任何挑戰意義^⑩，因為這些問題對於科學家早已不是甚麼新鮮觀念，它們是科

學知識成長機制的內在組成部分。至少從伽利略開始，科學家就是按照這套方法工作的。

第二，後現代理論有必要澄清其批判話語在知識論問題上的確切意義。

雖然後現代理論在原則上拒絕或迴避「總體批判」的方式，但仍有不少後現代主義者明確地或暗示性地以「全稱否定句式」來討論知識論問題，但其涵義卻經常曖昧不明。例如，「沒有離開權力的知識」這句被反覆引用的「後現代名言」究竟意味甚麼？如果說它只是意味「絕對的真理並不存在」，那麼幾乎沒有人會為此爭辯。正像人人都會同意「絕對健康的人是不存在的」這樣一個醫學陳述。在清晰的語言中，「沒有人是絕對健康的」也絕不意味一個在草地上健步如飛的運動者和一個接到了病危通知的患者具有同等的健康狀況。但正是在這樣的邏輯關節點上，某些後現代主義者以模糊的語言發揮了「卓越」的跳躍才能：「所有的知識都是社會、文化和語言的建構」可以被引伸為「所有的建構都同等有效或同等無效」；「絕對真理並不存在」可以被用來暗示「一切知識的相對真偽都無法定義、無法判斷」。當然，後一個陳述並非完全不能成立，但它需要證據支持，無法直接從前者邏輯地導出。

似是而非、閃爍其辭的浮誇文風在後現代言路中甚囂塵上的事實，是論辯雙方一致公認的^⑪。這種語言風格幾乎成為識別「後現代文本」的第一特徵。學術界有人譏諷說，「如果你不能寫得朦朧晦澀，你就沒有希望也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後現代主義者」。蘇卡爾曾坦言，他在編造那篇論文時，花了很長的時間才使語言達到了「應有」

「沒有離開權力的知識」這句被反覆引用的「後現代名言」究竟意味甚麼？似是而非、閃爍其辭的浮誇文風在後現代言路中是公認的事實。有人譏諷說，「如果你不能寫得朦朧晦澀，你就沒有希望也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後現代主義者」。蘇卡爾曾坦言，他在編造那篇論文時，花了很長的時間才使語言達到了「應有」的模糊水平。

德里達應法國《世界》周刊之邀發表觀感，除了反覆指責蘇卡爾的惡作劇「很不嚴肅」之外，唯一的回應就是他「沒有甚麼新的東西可說」。互聯網上有人評論說，一位解構大師對蘇卡爾的任何論點毫無「解構」，卻大談嚴肅不嚴肅的問題，實在耐人尋味。

的模糊水平。他還談到他與一些後現代論者的接觸經驗：「許多貌似新穎激進的觀點一經清晰的語言追問，就變得不那麼激進，而且很容易讓人接受，但卻不再是重要的了。」^⑭

那麼，在知識論問題上，後現代批判的確切涵義究竟是甚麼？如果只是「絕對真理並不存在」，那它沒有多少新穎的思想意義，這本身也不是一個後現代陳述。如果意味着「任何知識都無所謂真偽」，那它就必須有效地回應整個自然科學界的挑戰。值得注意的是，後現代批判在激烈否定科學方法有效性的同時，從來不曾充分地解釋為甚麼自然科學可以在那麼長的歷史實踐中保持生生不息的知識新陳代謝，為甚麼科學共同體內部能夠展開最為有效、最少歧義的交流對話，甚至可以超越不同文化、語言和政治背景所構成的障礙。這當然不是所有後代理論都必須面對的問題，但的確是那些主張或暗示了「無真理面前所有知識一律平等」的總體批判言路無法迴避的問題。

第三，後代理論有必要認真反省對當代科學成果的誤解和濫用。

這也許是圍繞「蘇卡爾事件」的討論所帶來的最直接、最明確的啟示。一些後現代主義者對科學方法的大加鄙薄，毫不妨礙他們同時引用「科學證據」來支持某些後現代論點。一些人文學者以望文生義的「虛假博學」方式闡述——從「測不準原理」、相對論、哥德爾定理到「混沌理論」、「非線性時間」、突變論、災變說等等——當代科學的前沿學說，發掘其中的「後現代意義」。這一「奇妙的景觀」激起了許多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的強烈不滿。伴隨這場討論而推出的兩本著作《建在沙灘上的大廈：揭穿關於科學的後現代主

義神話》(*A House Built on Sand: Exposing Postmodernist Myths about Science*)及法文版的《知識份子的欺詐》，以大量的例證分析表明後代理論家，包括聲名顯赫的大師級人物德勒茲、拉康、李歐塔對當代科學的誤解和濫用達到了如何驚人的地步^⑮。

德里達應法國《世界》周刊之邀對《知識份子的欺詐》一書發表觀感，除了反覆指責蘇卡爾的惡作劇「很不嚴肅」之外，唯一的回應就是這個問題已經纏繞了他三十多年了，他「沒有甚麼新的東西可說，絕對沒有」^⑯。互聯網上有人評論說，一位解構大師對蘇卡爾的任何論點毫無「解構」，卻大談嚴肅不嚴肅的問題，實在耐人尋味。

第四，人文及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蘇卡爾明確表示，他與《社會文本》編輯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並不衝突，人文及社會科學家對自然科學所提出的很多問題是非常有意義的。例如，甚麼樣的科學研究項目被確定為重要的，研究基金如何分配，誰在其中擁有權力和聲望，科學家在制定公共政策中所承擔的作用，科學知識以何種方式轉化為技術，誰會從中獲利等等。他甚至同意，在一定意義上，科學討論的某些內容(如鑒別相互競爭理論的標準)是受到文化制約的，所以也應該在科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中進行分析。他所強調的是，這些研究應該具有嚴格的學術評判準則。雖然科學家與人文及社會科學家側重的方面不同，研究的對象和路徑也不同，自然科學方法論並不能在其他學科中被簡單的移植或借用，但這些差異並不應該成為排斥理性討論的藉口^⑰。

我們從這些評論中看到了蘇卡爾平和、公允的一面。但它們是泛泛而

論的原則性陳述，究竟怎樣的評判準則才算嚴格？到底如何討論問題才是理性的？哪些對科學社會功能的後現代批判可以達到嚴格的、理性的標準？在這些問題上還有相當大的爭論空間，其結果也未見分曉。

四 後現代批判的「主義化」傾向

應該特別強調的是，筆者認為，以上所有批評即使全部成立也不足以證明整個後現代的文化批判是一套背離了事實與證據的荒誕學說、根本經不起任何嚴格的學術標準評判。問題遠不是那麼簡單。這場爭論中真正受到有效攻擊的後現代論點可能是這一言路中最為拙劣的部分，有些甚至違背了後現代經典論說的基本精神（例如將「局部批判」擴張為「總體批判」），可以稱之為「庸俗的後現代主義」^⑩。在筆者看來，這種庸俗化傾向所伴隨的不只是對科學的曲解和濫用，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後現代「源流思想」的背離，而其癥結要害在於將後現代批判作為「主義化」的綱領來實踐。

馬克思曾宣稱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那些在形成後現代思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思想家，除了李歐塔之外，幾乎沒有人承認自己是「後現代主義者」或「後結構主義者」。德里達從未使用過「後結構主義」這個術語，並反覆強調「解構」從不是一個思想流派^⑪。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幽默地問道：「甚麼是人們說的『後現代』？我有點跟不上形勢。」他又明確表示：「我不理解有甚麼樣的問題對於被稱為後現代或後結構主

義者的人們是共同的。」^⑫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曾公開指責後現代主義，而拉康的學說是直接反對後結構主義的^⑬。

這些後現代思潮的「源流人物」之間有不小的差異，有些甚至是相互對立的。他們各自從不同方面對啟蒙以降的現代理性主義傳統提出了不同性質的問題，有些是建設性的，有些是挑戰性、顛覆性的，但其中沒有任何一位把自己的理論視為徹底瓦解這一傳統的「思想武器」，也從未聲稱能夠全面取代理性主義在知識、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各個方面的實踐。（對德里達來說，「解構」並不意味「摧毀」，它不過是一種「闡釋策略」；對福柯來說，他研究的是特定社會實踐中的知識—權力關係，而如何改變這種關係是重要的，但卻不是他所承擔的問題。）他們總是各自面對特定語境中的特定問題，謹慎地界定自己理論的有效邊界，從不假扮自己可以回答邊界以外的任何問題。在這些源流思想家那裏，並沒有一場「後現代」對「現代」的革命召喚，也沒有以後現代替現代社會的宏偉綱領。

用「後現代」的標籤統稱這些互不相同的思想言路是很勉強的，再加上「主義」的後綴就更加可疑。嚴格地說，「後現代主義」——將「後現代」這個反一體化的思潮用一體化的「主義」來總括——是一個矛盾術語（contradiction by definition），但如果實踐者對此保持充分的警覺，可以避免因「方便之用」而可能造成的簡單化危險。實際上，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一些學科和跨學科的研究中，許多具有後現代傾向的學者完成了相當獨到而出色的工作，其中不少對（揭示隱蔽的結構性不公正、反映弱勢族群的利益以及社

後現代思潮的「源流人物」從不假扮自己可以回答邊界以外的任何問題。在他們那裏，並沒有一場「後現代」對「現代」的革命召喚，也沒有以後現代替現代社會的宏偉綱領。嚴格地說，「後現代主義」——將「後現代」這個反一體化的思潮用一體化的「主義」來總括——是一個矛盾術語。

美國的人文學界目前出現了一種「後現代亞文化群」，在學術體制中擁有越來越明顯的權勢地位。在這種風尚中，「後現代」的標籤成為「知識先進」和「政治正確」的天然憑證，只要站在「後現代」旗幟下，就獲得了可以四面出擊卻免受批評的特權。這種傲慢與偏見激起了廣泛的不滿，這也是「蘇卡爾事件」之所以會產生強烈情緒反應的一個重要原因。

會的全面民主化等) 進步的政治實踐產生了積極的意義。

然而，庸俗化的傾向也開始出現並有蔓延的趨勢。庸俗的後現代主義者們真的將後現代思想言路作為一種「主義」，一種革命綱領，一種無所不能、無往不勝的批判武器來實踐。在他們那裏，源流思想家所樹立的謹慎的、細緻的、高度語境化的分析風範幾乎蕩然無存。到處可見的是，以引述代替證據，以關鍵詞（如「霸權」）遊戲代替邏輯論證，以宣言式的聲討代替深入詳實的批評。伊樸斯登 (Barbara Epstein) 教授在討論中指出，美國的人文學界目前出現了一種「後現代亞文化群」，在學術體制中擁有越來越明顯的權勢地位^②。他們激烈地攻擊和排斥異己的學術思想，因為啟蒙時代已經終結，除了後現代之外，其他一切思想言路都是「陳舊的和保守的」，可以一網打盡。在這種風尚中，「後現代」的標籤成為「知識先進」和「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 的天然憑證，只要站在「後現代」旗幟下，就獲得了可以四面出擊卻免受批評的特權。這種傲慢與偏見激起了廣泛的不滿，這也是「蘇卡爾事件」之所以會產生強烈情緒反應的一個重要原因。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後現代思潮濫觴於60年代的左翼政治運動，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實踐意義。正因為如此，庸俗化的後現代主義批判在社會政治的具體實踐中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就特別值得警覺。任何一種思想的濫用都是危險的，而任何一種思想都可能被濫用。後現代批判在此並不具有天然的豁免，打起後現代的旗幟也絕不意味着當然（學術上和政治上）的進步。在學術界，以「反抗霸權」

為出發點的批判言路本身正在演變為一種話語霸權，這種現象不止具有諷刺意味，更應使我們深省那種似曾相識的「始於革命家終為獨裁者」的歷史陷阱及其災難性結局。在社會政治實踐中，後現代批判可以用來支持正義的抵抗事業，卻也完全可能在特定的條件下與極端民族主義、恐怖主義和宗教狂熱結盟。一種開啟了批判和反抗的思想言路，一旦被庸俗化地濫用，也有可能流變為專斷與獨尊的意識形態，「後現代熱」就可能變成「後現代瘋狂」或「後現代夢魘」。

最後，筆者想以一個存而不論的問題來結束這篇評論。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是否、或者要在多大程度上對這一思想在歷史發展中的意識形態化負責？對列寧主義的黨國 (party-state) 政體的實踐負責？這是學術界至今仍有爭議的問題。而奠定了後現代思潮的那些源流思想學說與「庸俗的後現代主義」之間究竟有甚麼聯繫？這也許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註釋

①② Alan Sokal,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 *Social Text*, nos. 46-47 (Spring/Summer 1996): 217-52; 217-20.

③④ Alan Sokal, "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 *Lingua Franca*, May/June 1996, 62-64.

④ 有關的英文討論主要文獻見：
Lingua Franca, July/August 1996;
Dissent, Fall and Winter 1997;
Tikkun, September/October 1996;

November/December 1996; *New Politics*, Winter 1997等。

⑤ Alan Sokal and Jean Bricmont, *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 (Paris: Odile Jacob, 1997). 該書的英文版預計將在1998年9月出版。

⑥ 有關的法文討論主要文獻見：*Libération*, 3 December 1996, 30 September 1997, 6 October 1997, 18-19 October 1997; *Le Monde*, 20 December 1996, 3 January 1997, 14 January 1997, 18 January 1997, 31 January 1997, 11 February 1997, 18 March 1997, 30 September 1997, 11 October 1997, 20 November 1997, 12 December 1997; *Le Monde de l'Éducation*, January 1998; *La Recherche*, April, May, June, November, December 1997等。

⑦ Bruce Robbins and Andrew Ross, "Response by Social Text Editors", *Lingua Franca*, July/August 1996.

⑧ 蘇卡爾邀請任何不相信科學知識客觀性的人做一個實驗：從他住的公寓窗口走出去，看看會發生甚麼，他「順便說一句，我的公寓在二十一樓」。Alan Sokal,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An Afterword" n. 3, *Dissent*, Fall 1996。沒有任何人回應這個邀請。當然，按照我們熟悉的後現代話語慣例，問題立刻會被轉換為：「你讓我從窗口走出去意味甚麼？其中包含了甚麼樣的權力關係？」

⑨ "Letter from Evelyn Fox Keller", *Lingua Franca*, July/August 1996.

⑩ Stanley Aronowitz, "Alan Sokal's 'Transgression'", *Dissent*, Winter 1997.

⑪ 見註⑩及 "Alan Sokal Replies [to Stanley Aronowitz]", *Dissent*, Winter 1997。

⑫ 在紐約大學組織的公開辯論會中，洛斯承認學術理論中語言的朦朧晦澀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他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改變這種流行的文風。見Erich Eichman對辯論會的報導，"The End of the Affair", *The*

New Criterion, Mid-December 1996。

⑬ 蘇卡爾在接受《科學美國人》記者專訪時的談話，見Madhusree Mukerjee, "Undressing the Emperor",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1998。

⑭ 見N. Koertge, ed., *A House Built on Sand: Exposing Postmodernist Myths about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另參註⑩Sokal及註⑩書。

⑮ Jacques Derrida, "Sokal et Bricmont ne sont pas sérieux", *Le Monde*, 20 November 1997.

⑯ Alan Sokal, "What the Social Text Affair Does and Does Not Prove", in *A House Built on Sand*.

⑰ 雖然批評觸及到後現代思潮中的一些「經典人物」，但僅限於他們有關自然科學的直接論述，這遠不是他們工作的主要部分，即使其中存有嚴重的謬誤，也不能就此否定他們工作的主要價值。

⑱ Jacques Derrida, "But beyond ...", *Critical Inquiry* XIII (1986): 167.

⑲ Michel Foucault, "Critical Theory/Intellectual History", in *Michel Foucault*, ed. Lawrence D. Kritzman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33, 34.

⑳ Judith Butler, "Contingent Foundation: Femi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21.

㉑ Barbara Epstein, "Postmodernism and the Left", *New Politics*, Winter 1997.

劉 擎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系
博士候選人，麥卡瑟學者。